

## 加征与发还:战后初期胶东解放区公粮征收的考察

邓 广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摘要】**抗战时期,胶东行署的公粮征收主要依赖地主和富农,致使地富大量抛售土地,地富数量随之大为减少,反过来影响了政府的收入。同时,战时征粮办法也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村均产思想盛行。战后,行署为改变征收弊端,在前后两次制定的征粮办法中,均降低了对富农的征收,相应增加了中贫农的负担。内战爆发后,政府财粮紧张,被迫追加征收,胶东各地纷纷反映负担过重。意识到该问题后,行署及时发还部分公粮,缓解了中贫农的困难。胶东这一个案在体现了中共关心民众疾苦的同时,也表明,即便在内战初期,解放区政府已经开始面临农村资源汲取上的困难了。

**【关键词】**1946年;胶东解放区;公粮;征收;发还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2-0115-12

### **Additional Imposition and Partial Reversion: a Study on Grain Expropriation in Jiaodong Liberated Areas during Early Days of Civil War**

DENG Gu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Landowners and rich peasants were the main source of the Grain expropri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Jiaodong. Conversely, this practice resulted in large-scale selling of plots of lands and dramatic falling of the number of Landowners and rich peasants at that period. In turn it had impaired the government's revenue. Meanwhile, the method of the Grain expropriation substantially dampened the peasantry's enthusiasm.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with the goal to eliminate its drawback,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Jiaodong had worked out two regulations on Grain expropriation, in which it reduced the rich peasants' burden and correspondingly increased the middle and poor peasants' proportion. On the outbreak of the civil war, due to financial strain and short supply of commissariat, the Administration were compelled to make an additional imposition. Being aware of the issue, the Administration gave back some part of the public grain to the middle and poor peasants to relieve their difficulties. The cas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government in liberated area had faced the troubles in acquiring the resources from rural areas even in the early stage of civil war.

**Key Words:** 1946; Jiaodong Liberated Areas; burden; imposition; reversion

抗战结束后,继之爆发的国共内战中,中共战胜了原本在各方面更具优势的国民党。中共的胜利与农村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密不可分。然而,学界有关这一时期中共农村革命的探讨,多集中

[收稿日期] 2015-11-17

[作者简介] 邓广(1985-),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

于“动员”类的分析<sup>①</sup>,真正触及中共农村资源汲取的研究不多。

杨奎松、黄道炫和刘昶对中共早年在南方革命的研究可能最具启发性。杨奎松和黄道炫的研究都显示,中共在南方的根据地极大地受制于其割据地区农村资源的局限,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正是其竭泽而渔的结果<sup>②</sup>。刘昶对江南农村革命的考察认为,中共早年兴起于这些地区,以后却不得不转去北方,与在这些地区得不到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有密切关联<sup>③</sup>。但革命转移到北方,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学界对于近代华北农民的生存境况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大多认为华北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sup>④</sup>。让这些地区的农民提供大量的财粮物以及人力资源,其困难亦可想见。

在接连几年的国共战争中,中共的财粮需求巨大,战争条件下,农业生产又极不稳定,原本即贫困的农民承受负担的能力十分有限,中共党政军是如何化解这一对矛盾,一次次成功地渡过难关,最终取得胜利的?显然,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究的问题。国共内战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该问题的考察,宏观论述易流于表面,相较而言,微观分析更能展现历史发展的细微面貌,为此,本文选取战后初期胶东解放区的公粮征收作为该问题探讨的切入点。

公粮是抗战以来根据地党政军最主要的粮食来源,国共内战期间,胶东解放区贡献了山东解放区公粮总量的30%左右,这与其所占山东解放区耕地面积的约30%大体一致<sup>⑤</sup>。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胶东多丘陵、山地,少平原。据抗战前的调查统计,该地粮食亩产低于山东平均水平,户均耕地面积低于华北平均水平,故一般农户粮食收入偏低<sup>⑥</sup>。因此,公粮征收量的高低变动对胶东农民的生活影响也较为突出。

基于此,本文着重考察由抗战转入内战这一时期,中共胶东地方政府在公粮征收政策的制定上是如何考虑的,公粮征收量的变动对该地农民的负担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内战爆发后,在面对战争所需和农民生活所需这一对矛盾时,胶东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本文意图借助胶东公粮征收这一个案,探究从抗战到内战的转变过程中,中共在农村资源汲取时所遭遇的困境及其解决之道。

① 此类分析在参军、土改和诉苦等的研究中均有深入的探讨,相关研究如:王友明:《论老解放区的参军动员——以山东解放区莒南县为个案的分析》,《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香港)网络版2003年6月号;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等。

②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2-253、297-299页;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7-248、250、258页。

③ 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4页。

④ 尽管部分学者认为近代华北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对改善的程度大多也持谨慎态度。如马若孟对卜凯调查资料的分析,称农民生活“有轻微的改变”。([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5页)。坚持农民生活有很大提高的郑启东,在其关于近代农民赋税的研究中反倒也认为农民生活困苦(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31页)。李金铮的研究应更具客观性,他指出“刻意夸大农民生活的恶化趋势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而所谓改善同样不可拔高。农民生活的些微改进远不足撼动结构性的绝对贫困状态”(李金铮:《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⑤ 相关数据参见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5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449-455页。

⑥ 有关抗战前胶东农民土地占有和生产、生活的研究,参见陈国庆:《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3、107页。

## 一、抗战时期的征粮办法与引发的问题

对战后胶东公粮征收的考察，自然要回顾抗战时期的征收情况，1945年7月，胶东行署<sup>①</sup>财政处和区委调研室在经半年之久的实地调研后，得出胶东现行征粮办法过“左”的结论<sup>②</sup>。抗战时期，胶东征收办法“左”在哪些方面，这种“左”的征收办法又对政府的财粮收入和农村生产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一）战时征粮办法与农民负担情形

抗战时期，因交通阻隔和考虑到地区特点，胶东与山东其它根据地相比，具有更多自主权。中共山东省战工会<sup>③</sup>允许胶东行署在一些政策的制定上可参照上级指示，制定本区办法。在公粮征收上即是如此，较为明显的如1945年胶东公粮的征收并没有执行省战工会的新方案，而是继续沿用本区以往的征收办法。

抗战以来，胶东行署先后于1940年、1942年与1943年颁布过三种征粮办法。这些征收办法在保证胶东党政军财粮需求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其弊端。1940年征粮办法，是行署根据预估需粮数，按照各户的负担能力由县区乡层层摊派。该办法简单，但缺点亦明显，即各户负担不合理，拔“特户”（引者注：即特别富裕户）现象严重。如“文登某村免负担户占70%，就是说30%的负担户，负担了100%的粮数”，导致“许多富有者负担不起，卖地捐资，向敌占区逃亡”<sup>④</sup>。为了改进征收，1942年行署颁布新的征粮办法。此办法扩大了公粮负担面，但是却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因为该办法按人均产量多少累进征收，使得农户“加工、增肥料所增加的收获不但同样要征粮，而且往往因此而提高了征收率”。特别是，由于累进率跳跃发展，致使“收入多的实得的少，收入少的实得的多”<sup>⑤</sup>。1943年，行署又在上述征收办法上进行改进。但累进跳跃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变，人均产量150—300斤，每增加1斤累进增加0.02%；人均产量301—550斤，每增加1斤累进增加0.04%；人均产量551—900斤，每增加1斤累进增加0.06%<sup>⑥</sup>。结果仍是“贫农累进较慢，故其负担特别轻；富农累进较快，故其负担特别重”，“实际上仍把大部分的负担加在少数较富裕的农民身上”<sup>⑦</sup>。

征收办法如此，现实中各阶层的真实负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1944年，胶东区委曾对牟平县埠后村做过调查，借此可窥见农民负担实情。笔者根据该调查列举各阶层负担情况于表1。如表所示，该村地主李仁山负担比重高达97%，人均余粮仅12斤。此种情形并非个例，据调查者言，地主“一般是收入不够负担”<sup>⑧</sup>。另据1945年胶东七村调查，同样显示“一般的中小地主收入的地租，交纳公粮、田赋等负

① 本文所指行署是抗战以来，中共在根据地建立的地方行政机关。胶东行署为中共在胶东区的最高行政机关，直接隶属省府。

② 胶东区调查研究室编：《农民负担调查》（1946年4月），山东省档案馆藏（以下简称山东省档），档案号G24-1-12-2，第68页。

③ 山东省战工会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简称，该机构于1940年7月成立，1945年8月撤销，为抗战时期中共山东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

④ 刘居英：《关于征粮办法》，《大众报》1943年6月8日第1版。

⑤ 刘居英：《关于征粮办法》，《大众报》1943年6月8日第1版。

⑥ 《胶东区征收救国公粮暂行办法》（1943年6月15日），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4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94、95页。

⑦ 薛暮桥：《山东各根据地现行征粮办法检讨》（1944年3月），山东省粮食局粮食志编纂办公室：《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1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153页。

⑧ 胶东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一个村的负担调查》（1944年12月），山东省档，档案号G24-1-10-3。

担后,所余无几”<sup>①</sup>。除地主外,富农的情形也不乐观。埠后村富农李凤寿负担比重为 45%,比省府规定富农负担最多不超 30%的原则高出 1/2。该户与中农、贫农的余粮已相差无几。如若考虑到富农雇工较多的现实,问题会更加突出,1945 年调查显示“一般的富农雇工经营,每人除去负担后剩余 600 斤上下,再除去工资工食所省无几”,“仅能维持生活”<sup>②</sup>。这些调查表明,战时地富实际负担量远超政策所限,其负担过重是不争的事实。

表 1		1944 年胶东牟平五区埠后村各阶层实际负担情形						(单位:斤)
阶级	户主	人口	土地(亩)	总收入	负担量	剩余	人均余粮	负担比重
地主	李仁山	3	33.05	38	1206	36	12	97%
富农	李凤寿	12	53.5	8681	3930	4951	396	45%
中农	李瑞亭	8	26.3	3376	627	2749	343	17%
贫农	李士典	7	17.7, 租 2.8	2618	195	2423	346	6.5%

资料来源:胶东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一个村的负担调查》(1944 年 12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10-3。

说明:负担包括公粮、田赋、木柴、教育粮和其它等项。

此外,随着胶东农村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的深入,地富的地租收入减少,支付雇工的工资提高,这使得地主富农的实际收入大为减少,更加剧了他们的负担紧张。如海阳四区和牟平十区,地主反映“租子没有细粮,纳公粮可得纳细粮”<sup>③</sup>。“有的说不够纳公粮的”,如东海区母猪河地主邵盘之,1944 年每亩地租收入 23.16 斤,负担却为每亩 29.39 斤。以致出现“有的地主累年拖欠公粮”的现象<sup>④</sup>,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政府收入的稳定<sup>⑤</sup>。

## (二)征收引发的问题

由于抗战时期胶东对地富征粮过重,这使得地富普遍认为“自耕不如出租,出租不如舍地”<sup>⑥</sup>,加之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农村中占地较多的地主、富农多捐地、卖地,以此来逃避负担和政治斗争。

1946 年 6 月,胶东区委对文登、乳山和栖霞三县曾做过 104 村的挨户调查。据此可了解抗战期间胶东各阶层土地拥有量之变化。表 2 所示,1946 年胶东各阶层人均土地量差距已逐渐缩小。在人均土地占有量上,地主下降最为明显,富农有一定程度下降,甚至中农也有略微降低。表 3 显示,地富在抛售土地的同时,其阶级也随之改变,抗战结束后,地富数量大量减少,大多降为了中农。与之相对的是,表 2 和表 3 显示,农村中的贫雇农大多得到了土地,部分已经上升为中农。

① 胶东区调查研究室编:《农民负担调查》(1946 年 4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12-2,第 13 页。

② 胶东区调查研究室编:《农民负担调查》(1946 年 4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12-2,第 13、26 页。

③ 《区党委关于减租减息工作的经验介绍与指示》,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520-4,转引自陈国庆:《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第 147 页。

④ 《东海区母猪河平原三个村的阶层变化调查》(1945 年 6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11-2,转引自陈国庆:《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第 165 页。

⑤ 传统惯例“赋从租出”,佃户纳租,地主纳赋。晚清以来江南地区,政府为确保税收,政府积极介入地主对佃户的地租征收,即便中共也曾帮助地主收取地租。反差的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对地富采取高征收的同时,也通过减租运动减少了地富的地租收入,从而在经济上起到了削弱地主和富农的作用。

⑥ 胶东区调查研究室编:《农民负担调查》(1946 年 4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12-2,第 22、24 页。

表 2 胶东三区挨户调查各阶层人均土地占有统计 (单位:亩)

	时间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其他
文登县高村区	1940	21.89	5.94	2.99	1.26	0.4	—
(32 村)	1946	9.97	5.03	2.9	1.62	1.5	—
乳山县崖子区	1941	11.34	4.92	3.36	1.53	0.42	3.31
(33 村)	1946	7.25	4.79	3.34	1.81	0.74	3.85
栖霞县白洋区	1944	6.89	4.64	2.63	1.40	0.36	1.19
(39 村)	1946	3.73	3.26	2.66	1.75	0.54	2.06

资料来源:《文登县高村区阶级变化调查材料》(1946 年 6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22-1;《乳山县崖子区阶级关系变化调查》(1946 年 6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30-2;《栖霞白洋区阶层变化调查工作总结》(1946 年 6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529-1。

表 3 胶东三区挨户调查各阶层户数统计 (单位:户)

	时间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其他
文登县高村区	1940	60	286	1765	2797	28	92
(32 村)	1946	10	190	3158	2132	2	83
乳山县崖子区	1941	54	402	2097	1861	88	93
(33 村)	1946	15	296	3266	1407	11	70
栖霞县白洋区	1944	22	301	1272	1971	80	62
(39 村)	1946	2	156	1777	1913	33	47

资料来源:《文登县高村区阶级变化调查材料》(1946 年 6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22-1;《乳山县崖子区阶级关系变化调查》(1946 年 6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4-1-30-2;《栖霞县白洋区阶层变化调查工作总结》(1946 年 6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529-1。

地富人均土地和阶级比重的下降,削弱了农村中的剥削力量,中共为贫雇农谋得了利益。但反过来,这给政府的财粮收入带来了影响。这是因为公粮是按每户人均土地的多少累进征收,人均土地多,累进高,反之,累进低。地富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下降,使其公粮的累进率降低,即负担减轻,对政府而言,则意味着征收量的减少。而地富数量锐减,也使得政府难以再像以往那样,将负担的重心放在地富身上。尽管战后中农数量大量增加,但中农人均占地少,相应的累进率低,显然无法弥补由于地富减少所带来的公粮征收下降的损失。事实上,现实已经给胶东行署敲响了警钟。1945 年上半年胶东行署缺粮 4000 万斤,行署对缺粮原因的分析中,就指出“土地分散致使累进率与负担额减低”是其重要因素<sup>①</sup>。

战时征粮办法引发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抑制了农业生产。根据地财粮主要依靠农村,农业生产的好坏对中共就显得非常重要。抗战时期,中共对此一直特为关心,如开展大生产运动、建立互助组等,但现行征粮办法却使得农民生产情绪低落。这主要是因为征收累进率的跳跃发展和对富农的征收过重,使得占人口中数的中农不愿增加生产。早在 1944 年 3 月,省战工会就指出,胶东征收办法“累进差额略嫌太大,可能妨碍富农生产发展”<sup>②</sup>。事实也确实如此,1945 年胶东区委调查显示,现行征收办法不

① 《(胶东)财粮收支情况》(1945 年),山东省档,档案号 G31-1-1002-20。

② 《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对各行政区征粮办法的指示》(1944 年 3 月 26 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1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99 页。

仅使富农“普遍的下降,生产情绪不高”,即便广大中农也“大部是停止发展”<sup>①</sup>。抗战后期,胶东农村均产思想盛行。如东海区一些村庄的农民街头巷尾的谈论“将来每人三亩地,发到中农再不升到富农”<sup>②</sup>。这一时期,胶东行署机关报《大众报》几乎每天都有鼓励农民生产发家的相关报道,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了农村生产情绪不高的情形。

## 二、战后征粮办法的两次修订

战时征粮办法的弊端和引发的问题,使得胶东行署不得不对其进行修订。土地分散和地富减少,要求行署将征收重心下移,适度增加中贫农的征收。均产思想的盛行,又要求适量减轻对富农的征收,以鼓励农村生产的发展。

### (一) 1945 年拟定征收方案

1945 年夏,经实地调查后,胶东行署财政处和区委调研室拟定了新的征粮方案。该方案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经营地主及富农负担应稍减轻,中贫农负担略微加重一点”<sup>③</sup>。实际上,早在 1944 年底,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就曾对山东分局有过此类建议,指出“减租后,贫农中农粮税负担必须增加,地主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方能维持军费”<sup>④</sup>。只是不知何因,胶东并没有及时变更负担办法。

因系抗战胜利,拟定办法并未增加征收总量。只是为了改变田赋按亩征收的弊端,将其纳入公粮中一并征收<sup>⑤</sup>。与战时办法相比,新拟定办法具体改变有二:一是起征点降低,由人均产量 150 斤降为 100 斤。二是累进率提高,将对富农不利的三级跳跃累进改为直线累进。从累进率上看,拟定方案与现行办法相比,各阶层负担明显提高(见表 4)。但拟定方案因系包含田赋,故从征收总量上比较(见表 4),只是与中农及部分贫农相对应的人均产量 300—600 斤者,负担有所提高;与富农相对应的人均产量 700 斤以上者,负担有所降低。为了进一步保障富农利益,方案制定时,财政处还进一步设想将人均实际产量 750 斤以上者累进率由每百斤累进 5%降为 4%<sup>⑥</sup>。

表 4 1945 年胶东拟定征收办法与现行办法比较 (单位:斤)

人均产量		100	15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累进率	1945 年现行	0	1%	2%	4%	8%	12%	17%	23%	29%	35%	35%
	1945 年拟定	5%	7.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总征收量	1945 年现征	5	8.7	13.2	24.6	45.6	73	111.6	163	225.6	297	330
	1945 年拟定	3.2	7.2	12.8	28.8	51.2	80	115.2	156.8	204.8	259.2	320

资料来源:1.1945 年公粮征收沿用 1943 年办法,见《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 4 辑,第 94 页。2.1945 年胶东田赋按产量 5%征收,见胶东区粮食分局:《1946 年粮食工作情况报告》(1947 年 1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31-1-1008-1。3.1945 年拟定办法,见胶东区调查研究室编:《农民负担调查》(1946 年 4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12-2,第 69 页。

说明:1.1945 年总征收量已经加入田赋。2.在公粮计算上,现行办法是原产量先扣除 20% 农本,再对应原产量累进率计算。拟定办法是将原产量扣除 20% 农本后,再对应扣除农本后的累进率计算。

① 胶东区调查研究室编:《农民负担调查》(1946 年 4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12-2,第 13、15 页。

② 胶东行署:《各地报告材料》(1946 年 4 月 13 日),山东省档,档案号 G31-1-278-1,转引自陈国庆:《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第 217 页。

③ 胶东区调查研究室编:《农民负担调查》(1946 年 4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12-2,第 68 页。

④ 《关于山东工作的指示(毛泽东致罗荣桓、黎玉电)》(1944 年 12 月 25 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35 页。

⑤ 胶东行署对田赋按亩征收一直存有意,认为田赋不是依照农民贫富进行累进,按亩征收是属摊派性质。

⑥ 胶东区调查研究室编:《农民负担调查》(1946 年 4 月),山东省档,档案号 G24-1-12-2,第 70 页。



## (二)1946 年新定征收方案

抗战胜利后,山东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1946 年作为战后第一年,省府明显加强了对胶东区的领导。该年上半年,省府陆续向胶东下发田赋和公粮征收指示。这就与胶东行署上年所拟定的田粮合征办法相冲突,胶东行署面临如何征收的问题。

事实上,在该年年初,胶东行署就已向省府递交了本区田粮合征的方案,但省府并未给予答复<sup>①</sup>。2 月份,省府向山东各解放区下发上期田赋的征收指示,胶东行署只得遵从省府要求,征收田赋<sup>②</sup>。此后,限于政协会议达成的战后免征田赋条款,胶东又按照省府要求将田赋改为复员费继续征收。

田赋的提前征收,意味着胶东在公粮征收时已无法执行上年田粮合征的方案。行署在商讨田赋征收时,也明言“田赋征过之后,再收公粮时,即不再算在内”<sup>③</sup>。如此,胶东行署不得不再行修订征粮办法。1946 年 5 月省府公布该年征粮办法,允许胶东在参照省府办法的基础上,“可按本区之习惯改易”,但亦明确要求征收标准须依省府,“不得提高”<sup>④</sup>。

5 月 19 日,行署讨论参考省府办法制定的新方案。新方案与往年相比(见表 5),人均产量 700 斤以上者征收累进率普遍降低,人均产量 600 斤以下者,累进率普遍提高。这与上年拟定办法中所确定的降低富农负担,增加中贫农征收的原则吻合。

由于三四月间,行署已经征收了上期田赋(尽管后来更名为复员费),委员们多认为征粮办法中已不包含田赋,故在讨论会上,对新征收办法多有异议,认为中贫农累进过高,负担过重。有的表示“一般的在 400 斤以下的均比过去负担重,且均是基本群众”,有的称“这样 200 斤-400 斤均苦了”。对此,财政处不得不解释称,此前征收的复员费不是田赋,而该年公粮征收中必须要纳入田赋,“照咱们的开支情形,不征田赋不足开支”<sup>⑤</sup>。如果说,中贫农负担的增加是因为公粮征收中加入田赋,何以地富(人均产量 700 斤以上者)的累进率不仅没有因加入田赋而提高,反倒是降低了?显然,此种解释有些牵强。

表 5 三种公粮征收办法累进率比较 (单位:斤)

人均产量	100	15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945 年胶东实行	0	1%	2%	4%	8%	12%	17%	23%	29%	35%	35%
1946 年胶东办法	3%	4.5%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1946 年省府办法	2%	4%	6%	9%	12%	16%	19%	22%	24%	26%	28%

资料来源:1.1945 年胶东实行办法见《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 4 辑,第 94 页。

2.1946 年胶东办法见胶东行署:《五月份行政委员关于征粮办法会议记录簿》,山东省档,档案号 G31-1-73-2。

3.1946 年省府办法见《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 1 辑,第 197 页。

事实上,胶东该年征收办法是参照省府标准制定的,与省府累进率大体一致(见表 5),因此,中贫农负担的提高主要是受省府办法的影响,与公粮中是否加入田赋并无关联。已知的是,省府 1946 年公粮征收中不包含田赋,且与 1945 年省府办法大体一致<sup>⑥</sup>,将 1946 年省府累进率与 1945 年胶东实征累

① 分别参见:胶东行署:《财经会议记录》(1946 年 2 月 25 日),山东省档,档案号 G31-1-809-2;胶东行署:《五月份行政委员关于征粮办法会议记录簿》(1946 年 5 月 19 日),山东省档,档案号 G31-1-73-2。

② 胶东行署:《行政会议记录》(1946 年 3 月 8 日),山东省档,档案号 G31-1-73-1。

③ 胶东行署:《行政会议记录》(1946 年 3 月 8 日),山东省档,档案号 G31-1-73-1。

④ 《山东省关于征收三五年度麦粮工作的指示》(1946 年 5 月 18 日),潍坊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40-1-8-10。

⑤ 胶东行署:《五月份行政委员关于征粮办法会议记录簿》(1946 年 5 月 19 日),山东省档,档案号 G31-1-73-2。

⑥ 1945 年省府颁布的公粮征收办法并没有详细划分累进率,只是将农户按收入大体划分了五等户,并规定每等户的最高征收比例(见《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 4 辑,第 198 页)。将每等户的最高征收比例与 1946 年省府征收累进率相对照,两者大体一致。

进率对比,人均产量 600 斤以下者普遍加征(见表 5)。也即是说,1945 年胶东中贫农的征收量要低于山东其它解放区。1945 年秋征时,为保证政府征收量,省府曾要求胶东“将各阶层负担比例提高至前省政委会规定的各阶层负担比例”<sup>①</sup>也可证明。因此,从执行省府办法的角度考虑,该年胶东中贫农征收量的提高也是必然。当然,从中贫农实际缴纳的负担量上更可直观看出,该年复员费与往年田赋相抵消,而公粮缴纳量确实明显高于往年。

### 三、内战爆发后的追加征收

尽管胶东在该年公粮办法的制定上已经增加了对中贫农的征收,但这毕竟是和平时期制定的征收方案。行署乃至省府在财粮办法制定时均没有明显提高征收总量。因此,一旦战争爆发,财粮需求势必增加,依照原有征收标准,政府就会出现财粮收支的紧张。

实际上,在 6 月初内战尚未爆发前,山东解放区就已经显现了粮食供应不足的端倪。此时,已直接负责中共山东党委工作的华东局<sup>②</sup>告诫各地节俭财粮使用,称“根据去年征粮数计算,本足够 82 万人全年食用,但结果我们仅以不足 60 万人的食用就已造成青黄不接。”<sup>③</sup>

内战爆发后,随着战势的扩大,中共山东省府的财粮问题愈加严重。9 月初,华东局不得不召开财委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财粮危机。在该会议上,对山东解放区的财粮困难做了清楚交待。

财政方面,自四月以来,山东解放区物价不断上涨,平均上涨五到六倍,个别上涨十倍以上,致使开支扩大,“党政军民日常供给都遭受到很大困难”。战争开始后,又出现了“预算异常庞大”的新问题,“支出预算竟超过总收入之一倍半”。华东局称,收支间的巨大差额若依靠增发货币解决,将导致物价的继续飞涨,“到明年就不可收拾”<sup>④</sup>。

粮食方面,因该年解放区水灾地区近二百万亩,加之国民党军又侵占了十个县,省府原计划征收的 9 亿斤粮食,估计“减征当在一万万斤以上”。但是,为应对战争,脱产吃粮人数却不断增加。如“民兵民伕,动辄万计”,仅“民伕民兵之开支,几乎等于整个部队之开支”<sup>⑤</sup>。由此可知,在“收入大大减少,而开支却无限增加”的情况下,省府财粮捉襟见肘,已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在省府财粮困难的情况下,作为下级的胶东行署自然也不乐观。事实上,胶东的实际情况更为严重。该年国民党军为全力打通胶济铁路,在胶东南海地区与西海地区用兵甚多,致使胶东战事在山东尤为激烈。胶东行署的各项开支也随之增加,内战爆发不足三个月,胶东即反映“近几个月来的开支,远远超过以往分割局面下游击战争全年所需”<sup>⑥</sup>。

面对如此困境,华东局与山东省府多次强调精简人员和节约开支,但仅靠“节流”并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财粮短缺,在此种情形下,对农民追加征收成为不得已之选择。

① 《山东省政府关于今年秋季征收公粮的决定》(1945 年 8 月 20 日),山东省档,档案号 G4-1-38-10,转见《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 1 辑,第 190 页。

② 1945 年 10 月 25 日,山东分局与北上的华中局在山东临沂合并成立华东局,华东局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工作。其中对山东为直接领导,对华中是通过在苏北建立的华中分局领导。参见:李景田:《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1921-20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年,第 677 页。

③ 华东局:《关于目前粮食工作的紧急指示》(1946 年 6 月 5 日),山东省档,档案号 G46-1-24-8。

④ 华东局:《关于克服目前经济危机与今后财政经济方针的指示》(1946 年 9 月 9 日),济宁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2-1-1-1。

⑤ 华东局:《关于粮食工作指示》(1946 年 9 月 9 日),济宁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2-1-2-2。

⑥ 《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训令》(1946 年 9 月 10 日),《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 1 辑,第 356 页。



为应对开支,7月15日,省府要求提前征收下期田赋,明令各行署在8月底之前完成征收<sup>①</sup>。9月5日,省府决定“提高本年秋季公粮征收率百分之二十”<sup>②</sup>。不久,省府又追加每亩二十元的田赋并动员农民献棉<sup>③</sup>。因战事等原因,胶东下期田赋晚至9月才行征收,此时,行署已不再声言该年公粮中已包含了田赋的问题。而且,为避免追加田赋与下期田赋在征收时间上的冲突,胶东将追加田赋改为10%的附加粮,在公粮中一并征收,即胶东该年秋季公粮比原定征收量增加了30%<sup>④</sup>。

#### 四、农民负担过重与发还公粮

胶东行署对于农民负担情形是怎样认识的呢?7月,行署机关报以群众来信方式,对公粮征收进行解释,承认增加了中贫农负担,但认为“数目很少”<sup>⑤</sup>。8月,行署提醒各地要注意“下半年民负的加重及群众因负担、物价高涨,生活恶化而有意见”<sup>⑥</sup>。9月初,在追加征收公布前,行署已了解到“部分群众反映今年负担重”<sup>⑦</sup>。三则事例可以看出,行署清楚该年农民负担的加重。只是,行署相信农民可以承受这种相对较重的征收,行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过如下的看法:“由于几年来的减租减息、生产运动及现在的土地改革的开展,人民生活一般得到大大的改善和提高,增加一部分负担并不影响人民生活”<sup>⑧</sup>。

该年征收增加了多少?数据的分析会有更直观。表6反映的是两年总征收量的情况。对比发现,1946年胶东各阶层的征收量均大大提高,尤其是中贫农征收增加最为明显,人均产量200-500斤者与往年相比征收增幅超40%以上。这一情况从年底行署内部会议中也可得到佐证,会议称“今年征粮数比去年多一倍”<sup>⑨</sup>。这与该年胶东解放区面积扩大有一定关联,但该年上半年比1945年面积增加35%,人口增加34%,村庄增加58%<sup>⑩</sup>。下半年因战争爆发胶东解放区面积、人口和村庄数相应又有所减少,相对征粮数100%的增加,农民负担确实增重颇多。

① 山东省政府:《关于征收三五年度下期田赋的指示》(1946年7月15日),潍坊市档案馆藏,档案号40-1-8-17。

② 《山东省政府省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1946年9月5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4-1-56-2。

③ 追加田赋和动员献棉在9月9日华东局的内部指示中就已经向下级进行了传达,公开征收则到了9月22日。参见华东局:《关于克服目前经济危机与今后财政经济方针的指示》(1946年9月9日),济宁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1-1-1;《山东省政府关于动员献棉及增收田赋的指示》(1946年9月22日),《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4辑,第242页。

④ 分别参见:《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训令》(1946年9月10日),《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1辑,第356页;《增加附加粮的几点解释》,《大众报》1946年11月20日第3版。

⑤ 《调整人民负担,不是人民负担加重》,《大众报》1946年7月12日第3版。

⑥ 林浩、金明:《关于目前参军、财经和形势宣教问题给各地委的信》(1946年8月20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24-1-13-4。

⑦ 《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训令》(1946年9月10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1003-22。转见《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1辑,第357页。

⑧ 《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训令》(1946年9月10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1003-22。转见《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1辑,第357页。此类说法在报纸上也颇多出现,如《北申家村研究今年的征粮办法公平合理,奖励生产》,《大众报》1946年7月5日,第1版。

⑨ 胶东行署:《行政委员会记录》(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73-4。

⑩ 1945年上半年,胶东解放区村庄11359个,人口5507887人,面积95960平方华里。1946年3月,胶东村庄14534个,人口7401354人,面积129915平方华里。详见《山东省历年面积、村庄、人口统计表》,1946年4月,《山东资料选编》第16辑,第411、413页。

表 6 1946 年与 1945 年胶东征收总量比较表 (单位:斤)

人均产量	100	15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945 年征收	5	8.7	13.2	24.6	45.6	73	111.6	163	225.6	297	330
1946 年征收	6.16	11.96	19.59	40.32	68.34	103.67	146.25	196.14	253.29	317.77	389.08
增 幅	23.2%	37.5%	48.4%	63.9%	49.9%	42%	31.1%	20.33%	12.27%	6.99%	17.90%

说 明:1945年征收总量包括上期田赋、公粮和下期田赋。1946年征收总量包括春季复员费、公粮、下期田赋以及附加粮。1946年复员费和下期田赋的折算标准,参见胶东区粮食分局:《1946年粮食工作情况报告》(1947年1月),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1008-1。

除了征收总量增加外,具体粮色的要求上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困难。因战争缘故,士兵营养和驮炮牲口多需大豆的供给<sup>①</sup>,故该年秋征中增加了对大豆的征收量,使大豆征收量达到秋征量的30%。但该年“豆子歉收”,“许多(农户)全数交上不够,还得去采”。而市场价格,“去年豆子低于小麦一倍至一倍半,今年豆子与小麦则形成等价交换”,因此,购买豆子缴公粮“暗中增加额外负担”<sup>②</sup>。

对农民而言,负担并非仅限于此,农民还要承担各种非常规的村摊派,这些摊派名目繁多,如村办公费、参军费、子弹费、修工事费、演剧费、民兵服装费等,且各村征收也不尽一致,因此,具体数额难以准确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摊派多是因战争的剧烈而征收,故征收量明显多于往年。1946年底,胶东行署指出该年村摊派“往往占政府正税80%,甚至有个别的占到182%”<sup>③</sup>。

各种征收相加,农民所剩可支配粮食就大大减少。表7是根据行署对1946年胶东四县五个村庄农户收支调查的汇总。该调查详细登记了每户村民的粮食和副业收入,以及吃粮、赋税和日常花销情况,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该年许多农户存在缺粮的问题,其中四个村庄缺粮户达到35%以上,尽管文登河西村缺粮户低于10%,但该村28户收支相当,无余粮户也达29%之多。而且,该统计显示这些缺粮户多是中贫农。11月底,行署副主任孙子明也称“今年村中都有饥荒”<sup>④</sup>。

表 7 1946 年胶东四县五村缺粮户统计

村 庄	户数	缺 粮 户				总数	缺粮比重
		贫	中	富	地		
文登县河西村	131	3	7			10	7.6%
乳山县西港村	33	2	9	1		12	36.4%
荣城县岭后村	106	15	23	1		39	36.8%
牟平县沙巷子村	114	14	20	6	2	42	36.8%
文登县范家庄	86	28	12	1		41	47.7%

资料来源:《文登县高村区河西村典型调查表》(1947年),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1027-2;《乳山县西港村典型调查表》(1947年8月30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1031-3;《荣城县崖头区岭后村典型调查表》(1947年),山东省档G31-1-1029-1;《牟平县归山区沙岗子村典型调查统计表》(1947年9月25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1030-1;《文登县松山区范家庄村典型调查表》(1947年9月10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1028-2。

说 明:(1)缺粮系指粮食与副业收入减去负担、口粮、穿衣及日用花费后的情况。

(2)文登河西村除了10户缺粮外,另有28户收支相当,无余粮。

(3)人均年吃粮数大多在300斤左右,个别高者600多斤,低者100斤,未再进行统一。

① 胶东行署:《行政委员会记录》(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73-4。

② 胶东区党委:《为减轻群众负担与发还粮食工作的指示》(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24-1-596-3。

③ 胶东区党委:《为减轻群众负担与发还粮食工作的指示》(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24-1-596-3。

④ 胶东行署:《行政委员会记录》(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73-4。

由于该年负担过重,征收中必然会遇到阻力。胶东下半年的征收较晚,9月份始征下期田赋,秋粮征收则迟至10-11月份。晚至11月20日,胶东区委听闻荣成有农户因纳不起公粮而上吊,在此事调查中发现该县农民对征收过重的怨言颇多<sup>①</sup>。此时,各地征收信息也陆续反馈至行署。11月29日,行署主任曹漫之称“现各地要求减少秋粮征收,各处反映情况甚多”<sup>②</sup>。这从年底的征收总结和各地汇报中可有大致了解,如胶东粮食局长金明总结该年秋征时,称“负担太重,特别中贫农太重,北海有上吊的”<sup>③</sup>。威海市反映“中农以下负担重,收后无粮”;南海专署称“对军工烈属与鳏寡孤独照顾不够,负担不起”;北海专署报告征粮中“硬要命令,不宣传不教育,给粮就好”;西海专署“有的群众组织暴动”,如昌乐区某村“把征收员扣起来一天多”,而且“有的因怕负担,土改不敢要地。”<sup>④</sup>

行署在陆续收到各地反馈征收过重的意见同时,还接到省府继续催征的要求。11月26日,省府机关报刊发了省粮食局副局长冯平的征收指示,认为秋粮负担并不重,批评了某些同志的“仁政”观点,要求各地迅速完成征收<sup>⑤</sup>。因此,行署面临是按原计划如数征收完毕,还是照顾民情,适当减缓农民负担的两难选择。最终,行署遵从本地实际情况,于29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

此时,胶东下半年征收已大体结束,只有通过发放返还粮的方式缓解农民的困难。行署主任曹漫之充满感情地讲“打仗是为了人民,如果人民无力负担,仗就干脆不能打”。但返还也即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减少,有委员就提醒“须注意到是否能够用的,如果不够,再征就麻烦了”。最终,行署决定在严格地方精简和加强军队节俭的情况下,以做到“不因发还群众而影响战争”<sup>⑥</sup>。

行署财政处将发还区间设定在人均产量100-500斤之间(见表8),这一发还区间和发还比例的设定既可以看出中共的阶级路线,也与该年中贫农负担尤为加重的实际相吻合。行署会议讨论称,该年发还总量“占征粮数14%,加上须照顾者占20%,约6000万斤。”<sup>⑦</sup>在行署财粮紧张的情况下,如此高的发还比例也着实体现了中共对中贫农的体恤。根据讨论意见,行署当日即下发了发还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细腻的组织执行”,以安定群众情绪<sup>⑧</sup>。

表 8 1946 年胶东行署发还公粮比例

人均产量	100 斤	150 斤	200 斤	300 斤	350 斤	400 斤	500 斤
发还比例	100%	50%	25%	20%	15%	12%	8%

资料来源:胶东行署:《行政委员会记录》(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73-4。

## 五、结 语

1946年胶东征粮办法变更,增加了中贫农的征收,加之内战爆发后各种未及预料的征收,致使该

①《荣成县征粮中的谣言》(1946年11月24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1003-35。

②胶东行署:《行政委员会记录》(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73-4。

③《金政委总结粮秣工作》(1946年12月8日),见(胶东)粮食局:《三五年各县粮食工作报告》,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1010-2。

④《(胶东)各支局汇报粮食工作》(1947年1月15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1014-1。

⑤《省府粮食总局冯副局长发表谈话,号召节省粮食保护粮食》,《大众日报》1946年11月26日第2版。

⑥胶东行署:《行政委员会记录》(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73-4。

⑦胶东行署:《行政委员会记录》(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73-4。另,《大众报》的公开报道中,称胶东返还粮为该年公粮征收总量的30%。《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布告》,《大众报》1946年12月2日第1版。

⑧胶东区党委:《为减轻群众负担与发还粮食工作的指示》(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24-1-596-3。

年农民负担过重。好在年底,胶东行署顶住省府继续催征的压力,以发放返还粮的方式,及时缓解了农民的财粮困难。这一个案在体现了中共解放区政府关心民众疾苦的同时,也反映出内战初期中共在汲取农村资源时所遭遇的困境。

进一步追问,同样是山东解放区,也几乎同样的征收标准,何以胶东在该年征收时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需要发还粮食,而其它地区农民对征收的反映不似胶东般强烈?从该年年底胶东农村普遍缺粮的现实看,除了西、南海区部分县份因遭受水灾影响外<sup>①</sup>,这与开篇所述该地户均产粮偏低应有一定关联<sup>②</sup>。再者,抗战时期胶东中贫农负担低于其它地区,该年征粮办法突然大幅提升,加之,秋征30%的附加粮也明显高于其它地区20%的附加,因此对于该地中贫农,在产粮本不多的情况下,从前后年负担对比上也确实有突然加重,难以适应之感。

客观地说,战后因地富减少,中共将征收重心向中贫农倾斜,并非胶东个例。受抗战期间阶级政策之影响,山东乃至整个中共解放区均面临此问题。而且伴随着内战的扩大和土改的深入,这一问题也愈发明显。当然,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共产党人并不愿加重中贫农之负担,这从省府催征中所批判的各地征收人员的“仁政”思想即可看出。但更为严重的是,如胶东该年征收所反映出的,中贫农相对薄弱的收入可能无力承担中共庞大的战时财粮需求。

1946年的胶东个案已表明,在财粮征收问题上,中共与中贫农已成为矛盾的统一体。此时,内战才刚刚开始,双方在征收问题上的矛盾也才逐渐显现,此后,随着战事的扩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会日趋严重。胶东以发还粮方式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应急方案,体现了战时状态下中共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和妥善之法。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已悄然摆在了中共面前。

#### [参 考 文 献]

- [1] 陈国庆. 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 [2] 黄道炫.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3] 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 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4辑)[Z]. 济南:1985.
- [4] 山东省粮食局粮食志编纂办公室. 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1辑)[Z]. 济南:1985.

---

① 分别参见胶东区救委会:《平度、平北、掖县、掖南、昌邑、西海专署、昌南、莱西南、潍县遭受水灾情况报告》(1946年8月25日-9月22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328-31;胶东救委会:《关于抢救西南海水灾难胞给各级救委会的指示》(1946年9月26日),山东省档,档案号G31-1-266-10。

② 据已有学者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通用粮食(高粱或玉米)亩产大约180斤,同时期山东全省高粱平均亩产224斤,玉米平均亩产188斤。因此,在粮食亩产上胶东与山东其它地区存有一定差距,但差距也并非特为明显。见陈国庆:《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第32、33、53页。